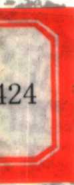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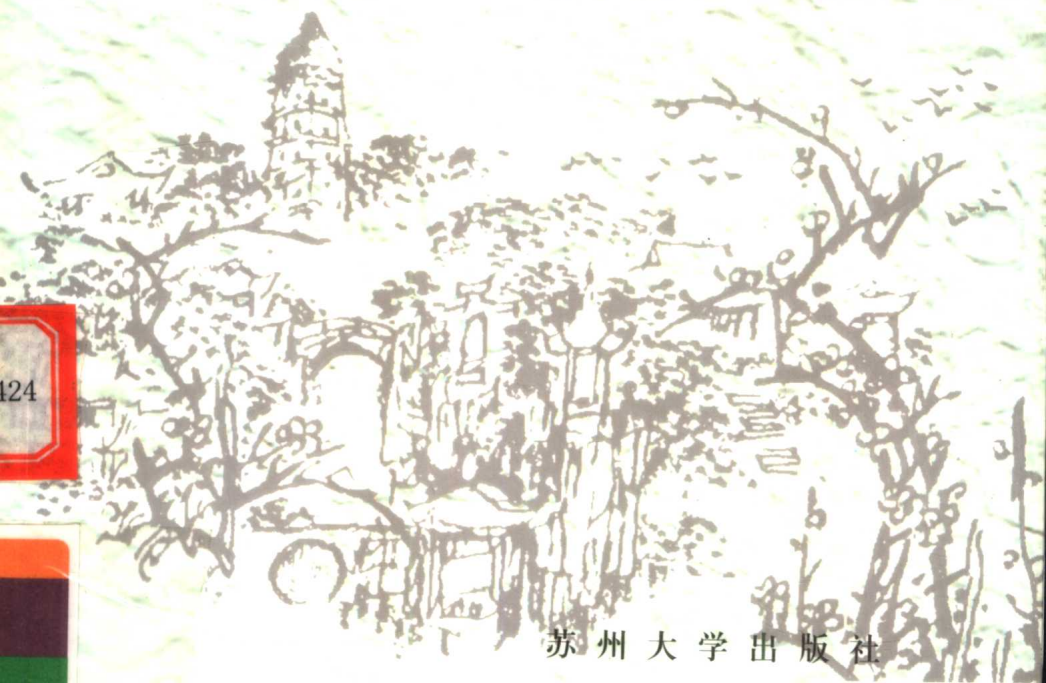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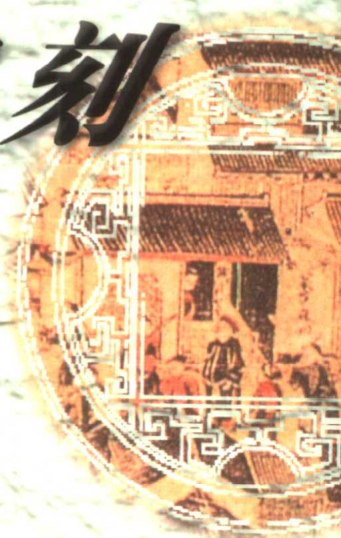




苏州碑刻

张晓旭 著



424

苏州大学出版社

张晓旭 著

苏
州
碑
刻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州碑刻/张晓旭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0.8
(苏州文化丛书; 2/高福民, 高敏主编)
ISBN 7-81037-712-4

I. 苏… II. 张… III. 碑刻-考古-苏州市
IV. K8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2684 号

苏 州 碑 刻		张 晓 旭 著	
责任编辑	朱坤泉	责任校对	刘 海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丹阳市胡桥镇 212313)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45 千字		
印 张	7 375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1037-712-4/J·14		
定 价	11.00 元		

《苏州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编 高福民 高 敏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成从武 杜世杰 吴培华

吴锡麟 张季裕 陆 凯

陈少英 陈长荣 陈 嵘

耿曙生

执行编务 缪 智 唐明珠 朱钧柱

《苏州文化丛书》总序

梁 保 华

苏州的历史源远流长,建城二千五百多年以来,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在这块得天独厚而又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苏州人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吴地文化,并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而在华夏文化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

苏州地灵水秀,人文荟萃。先辈们在这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丰厚性体现在古城名镇、园林胜迹、街坊民居以至丝绸、刺绣、工艺珍品等丰富多彩的物化形态,体现在昆曲、苏剧、评弹、吴门画派等门类齐全的艺术形态,还体现在文化心理的成熟、文化氛围的浓重,等等。千百年来苏州人才辈出,如满天繁星,闪烁生辉。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和文化内涵的丰富博大,是苏州成为中华文苑艺林渊藪之区的重要原因。

面对这么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有理由

为此感到光荣与自豪,但不应当因之而自我陶醉。文化之生命力在于繁衍不绝、生生不息的传承和开拓,文化长河之内在生机在于奔腾不息、永不终止的流淌与前进。苏州的文化经久不衰,源于世世代代不息的继承和传播,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正是由于一代一代人的辛勤探索与不断创新,使苏州的文化日益根深叶茂,绚丽多彩。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苏州人民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我们的目标是,努力把苏州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科教先进、文化繁荣、生活富裕、社会文明的地区,成为二十一世纪新的“人间天堂”。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文化的繁荣,渊源于悠久的历史,植根于今天的实践。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苏州文化资源开发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认真总结、研究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苏州文化的丰富宝藏,博采八方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苏州市文化局和苏州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苏州文化丛书》,是苏州文化建设中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有感于斯,写了以上的话,聊以为序。

1999年夏

《苏州文化丛书》总序

陆 文 夫

苏州是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得天独厚不完全是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还在于它的文化积淀的深厚;地理的优势是得于天,文化的优势是得于人,天人合一形成了苏州这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历史与文化。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轨迹,文化是人类精神的产品,产品有多有少,有高有低,从一个地区的总体上来看,人们拥有精神产品的多少与高低和人的素质是密不可分。

我不敢说苏州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不敢说苏州的伟人和名家就比其他的地区多,但是有一点要感谢我们的祖先和时代的先驱,是他们全方位地发展了苏州的文化,使得苏州文化的综合实力在全国占有优势。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要看它的综合国力,一个地区的文化是否昌盛,也要看它的综

合实力。苏州文化的优势是在于它的综合实力强大,文化门类比较齐全,从古到今一脉相承,只有发展,没有中断,使得每一个文化的门类都有一定的成就。

苏州园林已经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仅仅是苏州文化的一个侧面,即使从这一个侧面来看,就能看出造园艺术的登峰造极需要多少文化精品的汇合,诸如建筑、绘画、雕刻、堆山叠石、花木盆景、诗词楹联、家具陈设……每一项都是苏州文化的一个门类,都能写几部书。

苏州市文化局与苏州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苏州文化丛书》,囊括了苏州的戏剧、绘画、园林、街坊、名人、名胜、民俗、考古、工艺……向世人展示苏州文化的综合实力,用以提高苏州人的文化素养,提高人的素质,用以吸引与沟通五湖四海的朋友。文化的沟通是一种心灵的沟通,具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谁都知道,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来自于其民族文化,一个地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恐怕也是如此。

1999年7月21日

目 录

碑刻的文化内涵

碑刻的记事、印刷文化属性	(1)
碑刻的建筑文化属性	(5)
碑刻的艺术文化属性	(9)
苏州碑刻文化的特色	(19)

苏州碑刻博物馆馆藏碑刻

四大宋碑	(26)
工商经济碑刻	(39)
儒学碑刻	(47)
墓志与墓碑	(58)
图像碑刻	(66)
书法艺术碑刻	(77)

苏州其他碑刻

园林碑帖	(90)
佛教寺庙碑刻	(98)

其他宗教碑刻·····	(111)
城区著名碑刻·····	(117)
摩崖石刻·····	(125)

六县(市)碑刻与苏州 碑刻学家、刻碑艺人

吴县碑刻·····	(132)
常熟及其他县(市)碑刻·····	(144)
苏州的碑刻学家·····	(153)
苏州的刻碑艺人·····	(158)

附 录

碑刻文化词语简释·····	(184)
苏州碑刻博物馆藏碑名录(部分)·····	(196)
主要参考文献·····	(223)
后 记·····	(224)

碑刻的文化内涵

碑刻的记事、印刷文化属性

本书所说的“碑刻”，以碑为主，兼及其他石刻，所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说到碑刻文化，不管它是中国的也好，苏州的也好，从文化学角度而言，它既是一种记事文化，又是一种“死字”印刷文化，内容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领域。

首先，碑刻是一种记事文化。

所谓记事文化，意即碑刻是一部石头史书，碑刻上面的文辞是用于记事的。实际上，碑刻是继古代岩画、甲骨文、陶文、竹简、帛书、金文之后又一种经久不衰的“图书”，作为一种承载文化内容的方式，它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后在纸上写字的方式并行存在了两千多年。南宋初年大史学家郑樵曾一语点破碑刻的这一记事文化属性，他在所著《通志·

金石略》中说：“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这是说铜器刻辞的历史较短（局限于商、周），而石刻的历史则很长，从而说明了碑刻在古代中国刻辞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作为一种记事文化，碑刻是我国古代记载史实、保存和传播文化的特殊载体，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次，碑刻又可视作为一种古老的印刷文化。

确切地说，碑刻是一种“死字印刷术”，而不同于宋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专家罗振玉在《愔斋集古录·序》中曾说：唐以前无雕版，而周秦两汉有金石刻，故周秦两汉之金石刻，雕版以前之载籍也。他在这里明确地肯定了金石文字是雕版以前的“古书”。这一见地，从中国图书发展史角度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他的论述并没有涉及印刷文化。

我们说碑刻还是一种印刷文化，一是指碑本身实际上是一种印刷模子，只要在碑上按上一张纸，加以墨拓，就可以一拓再拓，直至碑石受损不能再拓为止。用纸墨加上拓墨工具从石碑上打印（即拓印）出来的黑纸白字的“印张”称为“拓片”（如按要求装订成册就称“拓本”）。这一发明始于六朝。对于先秦石鼓、秦汉刻石、三国两晋刻石，以至北朝石刻，当时史书上都不曾记有墨拓之事。连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中记录的两百余种古碑碑文，也是他根据在碑前的摘录或凭记忆叙录的。由此观之，至少在北朝时，还没有出现石刻文字的拓片（本）。

大约在南朝齐梁时代，人们才开始用纸墨拓碑。那时

专门用以拓汉魏石经,后来又继以拓秦刻石等。《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一卷,还有《一字石经》(“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等)三十四卷;《三字石经》(“尚书”“春秋”等)十七卷。这些都是黑纸白字的拓本,是梁朝宫廷遗留下来的残余。

到了唐代,拓片(本)已很普及,时称“打本”。例如,李肇《国史补》云:“德宗在东宫,雅知杨崖州。尝令打李楷洛碑,钉壁以玩。”(“打碑”就是拓碑,或称墨拓。)西安碑林所藏唐代《尊胜陀罗尼经幢》最后一行刻着“元和八年八月五日女弟子那罗延建尊胜碑打本散施,同愿受持”;窦蒙《述书赋》注云:“周宣王猎碣十枚,上有篆文,今见打本”,它们所说的“打本”,也就是“拓片”。唐代诗人韦应物对拓片有一段非常形象化的描述,其《石鼓歌》云:“令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白分。”(“脱其文”就是拓其文,亦即打印成拓片;沾湿了纸,“既击既扫”地用墨打取石鼓上所刻的文字,形成黑纸白字,故称“黑白分”。)唐代拓片实物传世稀少,笔者所知只有两种,一种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唐拓本《唐新集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另一种是北京文博研究所所藏《汉武梁画像题字》。以上两种都是著名的唐代拓本实物。

到了宋代,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墨拓这一“死字印刷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汉仓颉庙碑》额左刻有宋嘉祐庚子五月乔岳、吕大忠、万年、朱吉“打碑记”及题名,这应该是当年乔岳等人打取此碑拓本之后留刻的文字,而且当时已正式出现了“拓本”这一名称。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谈到《汉熹平石经》时说:“此石刻在洛阳,本在洛宫前御史台

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时时得之,若骐驎一毛,虬龙片甲。今张焘龙学家有十版,最多;张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晋玉家有小块。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在《跋刘宽碑》文中说:“因令工椎拓二碑及阴文,装为三帙。”椎和拓都是拓碑的工序。椎,是用椎(似榔头之类的木制工具)打纸入碑;拓,是用毡包往纸上上墨。欧阳修在其著作里也谈到拓本问题,如其《跋武班碑》云:“后得别本,模搨粗明,始辨其一二。”又跋《搨阮君神祠碑》云:“施君为陕西都转运使,为余摹此本。”又《跋大唐中兴颂》云:“模打既多,石亦残缺。”这里的模、搨、摹、打,均指从碑石上打取拓本。宋拓本传世也不多,著名的有《汉西岳华山碑》拓本(现存日本),《汉魏元丕碑》拓本(孤本,现藏故宫博物院),《魏范式碑》拓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所谓搨本,是指一种影写本。其制作工序是把纸按在石碑上用笔描取文字。与拓本相反,影写本是白纸黑字。这一发明始于南朝梁代,与拓本之发明均可谓中国科技文化史上的创举。

说碑刻是一种印刷文化的另一层意思,是就碑本身的翻刻和复刻而言的。自从发明了拓本和搨本后,一块碑可以化身为千百份拓本;而根据拓本,就可刻出原碑的复制品来,这就是碑的“翻刻”或“复刻”。打开一部中国碑刻史,碑的翻刻或复刻不胜枚举。例如《岫嵎碑》,原碑在唐宋间已不存,到了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何子一就依据旧拓复刻了一块,现存于岳麓书院;明代嘉靖中,杨慎(升庵)也复刻了一块,石在安宁州(今云南安宁县);明万历年间,杨

时乔在江苏栖霞山天开岩也有复刻；康熙丙午(1666)毛建在陕西西安也有翻刻；清康熙癸丑(1673)，李蕃四又翻刻于山东黄县。《秦峰山刻石》也是如此，原石早毁，宋郑文宝据南唐徐铉摹本重刻于西安，今存陕西省博物馆；元申屠駉又据郑文宝刻本重刻于绍兴。又如《唐扶风庙残碑》，原碑早已不知去向，但据记载，浙江湖州、杭州均有此碑复刻。

碑的翻刻或复刻，使已经毁灭了的碑刻能以复制品的面貌重现于人间，又能使某一碑刻变成内容重复的数种碑刻，而这些内容重复的碑刻经过捶拓，又可转化为众多的拓本；反过来，这种拓本又可根据需要刻成许多同一内容的碑刻。复刻品的文物价值当然不如原刻，但从文化传承、传播的意义上讲，碑石本身的翻刻或复刻却也体现了一种印刷文化。另外，在原物已毁或将毁的情况下，碑的翻刻或复刻，在客观上又起到了抢救、保护和传播文化遗产的作用，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立了大功的。

碑刻的建筑文化属性

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显赫地位，这一点早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这种地位的确立，除了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特有的建筑风格外，中国古代碑刻也立下了不少功劳。碑刻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组成部分或建筑环境要素。可以说，凡古代中国之山川名胜、帝陵、寺庙、道观、皇家宫殿、园林等一切古典建筑均离不开碑，我们很难想象在中国存在着没有碑的古典建筑。因此，在某种意义

上说,中国古代建筑是包含着碑的建筑,而碑则体现了一种古老的建筑环境文化。

具体来说,碑所体现的这种建筑环境文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碑与古代建筑互不分离。碑是一种建筑标志。在古代中国,凡坟墓、宫殿、园林、寺庙等建筑群中均树碑石,用以说明被标志的是什么建筑物,并且载录与之相关的人文、自然内容。从东汉开始至清末,坟墓前均竖立墓碑。坟墓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建筑,包括地面和地下两部分。墓碑除说明是某某人之墓以及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外,往往还详细地说明了墓的位置、大小、尺寸及用工数。魏晋时曾禁碑,这种墓碑就换成了另一种形式,即不竖立在地面坟墓前,而是缩小尺寸埋入墓内(一般是正方形),碑刻史上称为墓志或墓志铭,在功能上,它也是一种建筑标志。南北朝以后,墓碑与墓志同时使用。

除了墓碑、墓志外,墓阙和墓前神道上的华表(石柱)同样起着这种作用。墓阙是墓前的建筑物,往往左右相对。阙一般高4到6米,都用石块雕凿成木结构建筑的外形,垒砌而成。阙身下面有基座,上面盖有单檐或重檐的屋顶。墓阙上往往题刻墓主名分,有些阙还记载作阙年、月、日,作阙者姓名、石工姓名及其用工造价等。例如,现存四川境内的汉代高颐阙刻有铭文曰:“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贯光”;山东嘉祥县武氏阙除刻有上述类似铭文外,最后还刻有“使石工孟季、季弟卯造此阙,直钱十五万”等内容。

神道华表也是古代建筑的一种标志,除被用于宫殿、宗庙、邮亭、交通大道中央外,还被用于坟墓之前和通道两侧。这一形制在东汉时就已盛行,一直延续至清代。它往往与墓前的石阙、石碑、石兽配套。“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注)以南朝为例,现已查清的南朝陵墓有三十一处,在各陵墓神道两旁均竖有石柱。这些石柱柱身为圆形,周围饰以爪棱形直纹,柱上嵌有刻文石碑,说明是谁人之神道。例如,萧景墓的石柱上端正面有一块刻文石碑,上面刻有反书(楷书体)“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字样。柱顶有莲花纹圆盖及蹲坐小辟邪。现存南朝陵墓中,以梁吴平忠侯萧景墓、临川靖惠王萧宏墓、南康简王萧绩墓的石柱保存较为完整。

此外,如宫殿、寺庙、道观门前也常常竖立石碑,这种碑石都起着建筑物的标志作用。园林也是一样,如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曾在洛阳城内东北隅景阳山南立了一块石碑,题为“苗茨之碑”。明帝时,在此兴建皇家园林,称作“芳林园”,后改为“华林园”,这块碑也就成了中国园林史上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一块园林石碑了。以后历代兴建园林均竖碑,宋、元、明、清各代,园林兴建达到高潮,有皇家的,有官吏的,有巨富的,有文人的。这些园林均有碑,所刻内容都富有历史文化价值。

第二方面,碑本身就是一种建筑。碑与其他建筑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一种建筑环境文化。碑与主体建筑互相依存,互为作用,构成一种建筑环境,表现出特定的文化内涵。